

二〇〇一年的梵中（共） 關係之研析

喬 一 名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三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

梵蒂岡不同於一般國家，係以宗教立國，自認為「宗教實體」（Religious Entity）。就領土與人口而論，教廷所在之「梵蒂岡城國」乃一迷你小國，惟當今全球有十億八千餘萬天主教信徒，梵蒂岡與一七四個國家締有外交關係（另加俄羅斯駐梵外交代表團），且係聯合國等各重要國際組織之觀察員。教宗經常針對世局發出和平、正義呼聲，故在信仰及精神上，梵蒂岡可稱為一大國，在國際政治上仍具有相當影響力。

在對華政策方面，教廷一方面希望與我中華民國繼續維持良好之宗教關係，另方面亟思與中國大陸改善宗教關係，建立外交關係，以謀促進大陸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俾使大陸之天主教會能重新與羅馬普世教會合一、共融。根據「聖統制」，我國大陸、台、港、澳地區均屬普世教會的「中國教省」，因之教廷所採「一個中國」政策，即根植於宗教上「合一、共融」之觀念。惟梵方高層亦坦然透露，其對華政策之「兩難困局」；是故，梵方衷心祈望兩岸關係能早日改善，及彼此就國際地位一事取得協議。

由於教廷外交為促進傳教自由之「工具」，與一般國家追求「國家利益」不同，故教廷亟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目的，係維護大陸一千餘萬天主教友之信仰自由及教會之傳教自由。自去（二〇〇〇）年年初起，教廷與中共當局已建立「非正式對話機制」，就有關雙方關係正常化問題交換意見，惟因中共堅持不得以宗教理由干涉其內政，且執意扶植「愛國教會」，不允大陸天主教會與羅馬普世教會共融，雙方對話迄無重大進展。

關鍵詞：宗教實體、聖統制、若望保祿二世、羅馬普世教會

* * *

一、前　　言

梵蒂岡是我國在歐洲僅存的邦交國。梵蒂岡雖然是一個宗教實體，但她卻在國際政治體系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當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八四年於梵蒂岡宮中接見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時，國際政治觀察家即知悉蘇聯政經制度即將面臨重大改變。因為一個標榜無神論的蘇聯領導人，在會面西方羅馬公教領袖時竟向其屈膝致意，則其所堅持的無神論信仰將很難繼續下去；若然，俄羅斯的東正教將復興起來，並恢復她在俄國人民心中的歷史地位。波蘭共黨的瓦解，菲律賓馬可仕政權的垮台，天主教會都在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梵蒂岡（Vatican）是位於義大利首都羅馬西北高地上的城國，全梵蒂岡城國，面積零點四四平方公里，為世界上最小的國家。以梵蒂岡城牆，包括聖彼得廣場、聖彼得大教堂、教皇宮等為領域。主要人口為義大利人，信奉天主教。首都梵蒂岡城。

公元四世紀開始，羅馬城主教利用羅馬帝國的衰亡，乘機掠奪土地，六世紀獲得羅馬城的實際統治權，稱為「教皇」。七五六年法蘭克國王丕平（King Beping）將羅馬城周圍區域送給教皇。此後在意大利中部出現了以羅馬為首都的「教皇國」，其疆域多有變遷。一八七〇年義大利王國消滅教皇國，教皇退居梵蒂岡宮中，世俗權力結束。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墨索里尼為求得教皇的支持，同羅馬教廷簽訂《拉特朗條約》，承認梵蒂岡為屬於教皇的主權國家，教皇或稱教宗在其領土上擁有世俗統治權。

依據「梵蒂岡城國基本法」第一條梵蒂岡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教宗是首腦，擁有立法、司法、行政權。教宗自稱為「基督在世代表」。教宗由樞機主教團成員以三分之二多數選出，任職終身。梵蒂岡現在一百七十四個國家和地區派有大使、宗座代表或代辦^①。

或許有論者說教廷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是相當有限的，因此探討這一議題價值有限，顯然是其片面主觀的看法。輔仁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巨著中共與梵蒂岡的關係，梁潔芬女士的博士論著。梁書從歷史脈絡中探討梵中（共）關係，可見研究梵蒂岡問題仍有其學術的價值^②。筆者注意梵中關係已有多年，在過去的一年（二〇〇〇年），梵蒂岡與中國大陸確實都發生了幾個重大事件，深切影響了未來梵蒂岡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梵、中、台三角關係是如此密切；任何一邊的改變，都必然影響另一邊的關係，其中原因之一是梵蒂岡堅持其聖統制下的「一個中國」政策所致。

陳水扁新政權甫上台之際，外電不時傳出教廷與中共關係正當化的傳聞；陳總統及外長田弘茂接見教廷駐韓大使慕正義總主教時均表示，我們不希望看到，在中華民國積極努力改善與中共關係時，台、梵之間情誼有所改變，也不樂見台灣人民及中華民國的利益遭受任何犧牲。總統更指出，宗教自由在中國大陸是有「問題」的，中共

註① 王克祿著，梵蒂岡簡介（台北：思高聖經學會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四日出版），頁一二～一五。
教廷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頒佈新條定「梵蒂岡城國基本法」。

註② 梁潔芬，中共與梵蒂岡的關係（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六月），頁二～一〇。

領導人也從未放棄對台動武，然而，堅持用武力對待人與對一個地方使用武力的行為，其實是不夠文明的，也不是真正的尊重民主^③。

代表教廷來台參加陳總統就職典禮的慕正義總主教表示，中華民國人民是神所賜福的子民，然而，於此同時，中國大陸正有很多人受著不同的磨難，這也是教宗在宗教方面對中國大陸表現關切的原因。教廷不時關切中國大陸，更不時傳出雙方建交的消息，特別是在一九九九年內，傳聞建交的消息此起彼落，例如新加坡天主教新聞週刊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刊出韓德力神父的一篇冗長的論文，題目是「中國和教宗若望保祿在二〇〇〇年成為朋友」，他意思是叫人認清時代的訊號，響應教宗修好的呼籲。韓德力撰文說：「如果外交關係正常化了，梵蒂岡派一位大使來到北京，而人民中國的大使要到梵蒂岡，取代台灣的大使。……這個突破大概不會在明天出現，但一定在二〇〇〇年出現，這為中國天主教的確是一大突破，在中國，官方和地下教會的團體將結合為一，公開的、正式的為教會及政府所支持^④。」這篇文章只是韓德力神父對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的個人願景，但不可否認也多少反映了教廷的某種心聲。因為從一九九九年初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Cardinal Angelo Sodano）談話，發出「遷館論」報導，為台梵關係投下一顆警爆彈；八月香港太陽報，十二月南華早報和法國媒體，都作了梵蒂岡將在公元二〇〇〇年內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與北京建交的報導。我們若從台北來看有關梵中建交傳聞，真可說是各種說法紛陳，實在讓人目不暇給。

但，若由梵蒂岡和中國大陸內部的變化，來觀察二〇〇一年台、梵、中三邊關係的發展，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客觀的結論。畢竟，台梵邦交能維持多久，前外交部次長程建人也坦稱不知道^⑤。基於對傳教的使命和教會的普世性發展，教廷當然希望能再次「登陸」，照顧中國大陸上近千萬的天主教徒。由這一點分析，「外交政策」是梵蒂岡達到傳教的手段和工具。但兩岸當前的事實是，中國大陸沒有宗教自由，所以無法和教廷發展正常關係，而台灣雖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但因為教友總數不到三十萬人，且受困於「一個中國政策」之故，因此雖然和教廷有外交關係，但與梵蒂岡卻經常有「遷館」之警訊傳出，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

公元二〇〇〇年元月十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駐教廷使節團成員一百七十一位大使會見時，發表「建立世界新秩序」說話時，特別提到「中國人相互對話」，南北韓亦復如此；都顯示教延期許兩岸儘早為維護世界新秩序展開和平互動^⑥。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雖然在主觀上，十分願意在他位之年，完成與中國大陸的外交關係正常化，無奈這幾年來所發生的「三件事件」，嚴重打亂了教廷的對華（兩岸）外交的部署。這「三件事件」即是：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七日中共國務院有關方面發出的一件整肅大陸「地下教會」的文件，簡稱「八一七文件」；二〇〇〇年一月六日正

^③ 陳水扁，「不希望中梵關係生變」，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第十四版。

^④ 教友生活周刊（台北），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四版。

^⑤ 「台梵邦交能維持多久，程建人坦稱不知道」，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十四版。

^⑥ 教友生活周刊，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四版。

是天主教會的「主顯節」，若望保祿二世在聖彼得大殿，祝聖十二位主教之際，中共亦在北京南堂（北京教區主教座堂）祝聖五位主教。這項「主顯節事件」，暫時終止了二〇〇〇年梵中建交的所有傳聞。二〇〇〇年三月十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梵蒂岡宗座大樓召開公開樞密會議，宣佈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的趙奧斯定等中國「致命真福」，將在十月一日隆重冊封為「致命聖人」。「宣聖事件」從宣佈到最終冊封，中共與教廷的立場可謂是南轅北轍，雙方關係降到了冰點。

「三個事件」的發生與影響，看似個別孤立，究其實卻是環環相扣。可以說二十世紀末所發生的「三個事件」，或許將深深的影響二十一世紀前十年梵中關係的進展。當然，如何客觀的正確解讀上述「三個事件」，固然是不容易，但若把握一個基本原則，最終也不難解讀。這個基本原則就是教廷的最根本考量之一是宗教問題，也就是如何能拓增信徒，廣揚天主教的教務，畢竟「教廷」是一個宗教人士組成的政治實體，政治目標並不是主要的考慮。相對的，中共的最根本考量之一是政治問題，中共猛烈批評教廷「封聖」，其實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中共真正的目的，是鞏固大陸的教會控制權。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一萬多字「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明文宣示中共與教廷改善關係的兩項條件：(1) 教廷應先與台灣斷交，並「承認中共係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 教廷不得藉宗教之名干涉中共的內部事務^⑦。

展望中共與教廷的關係，其未來最大的障礙就是在中共所提的「兩項條件說」。所謂教廷不得藉宗教之名干涉中國大陸的內部事務，其中之一是「主教任命」問題。中共認為主教的「自選自聖」攸關內政，它不僅是一個宗教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其政治意義遠大於宗教意義。但是，「主教選聖」問題，對教廷而言是一個宗教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問題，教廷對此自然是慎而重之，絕不輕言變動。當前看來「主教選聖」問題已不是主要障礙了，而是中共當局對天主教的態度與看法。如果中國大陸政治生態更加寬容，對現存的兩個教會，一個地上教會（愛國教會），一個地下教會（忠於教宗的教會），給予更大的空間讓他們自然的融合，不再限制大陸主教對教宗的服從權，如此中（共）梵關係始有可能發生重大的突破。

二、「八一七文件」的產生

「八一七文件」的重要性在於：中共國務院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中旬已訂定有關梵中（共）建交前後對天主教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具體措施，亦可將此文件視為中共與教廷建交後之新階段或新形勢，所採取之對天主教政策及措施之調整。「八一七文件」是中共內部文件，從未正式出版過；但文件卻流傳海外，影響極大。

1. 「八一七文件」之重大意義和目標，由下述引文可見：

^{註⑦} 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第一版。「白皮書」無正式單行本，原文登在人民日報上。

「『梵』不得干涉我國內政，包括不得以宗教事務為名干涉我國內部事務。」「『梵』還會企圖利用中梵關係調整，否定我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重新控制我天主教會。」「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要大力加強天主教愛國組織建設，切實抓緊教育轉化天主教地下勢力，維護社會穩定，確保我國天主教會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愛國力量手中^⑧。」

2. 「八一七文件」持續強調「社會穩定高於一切」的重要性，對此必須採取有力措施：

「高度重視中梵建交期間的維護社會穩定工作，充分估計到可能出現的不安定因素。早研究、早部署、早作預計。」「中梵建交後羅馬教廷利用合法地位干涉和控制我國天主教會的圖謀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天主教地下勢力影響較大地區要做好信教群衆的引導和教育工作，防止出現『宗教熱』。要堅決制止天主教地下勢力藉機舉行大規模的集會，示威和遊行活動。」「對建國以後無有定論，近幾年在綜合治理中依法處理的案件，一律不得翻案。」「要防止在中梵建交之際出現修教堂熱。」「對已拆除的天主教地下勢力，非法修建教堂，一律不許重建。」

3. 由八一七文件可知，中共一直設定共產黨及其政府對付天主教的工作在其宗教政策中，是最重要的，須不斷加強，即使建交後亦無意改變：

「主管部門領導要深入基層，深入群衆，一個一個地做好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工作，面對面地做好信教群衆的工作。」

- (1)「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建設。」
- (2)「宣傳黨的宗教政策和有關法規。」

(3)「依國務院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問題比較多的，特別是天主教地下勢力控制的活動場所要重點進行整頓。」

我們從「八一七文件」的精神中深入觀察，可知：教廷片面的期望中共在梵中關係正常化後，中共或許將對宗教採取較容忍態度，甚至羅馬教宗擁有挑選中共官方愛國教會主教的權力；乃是一個危險又真實的幻想。吾人的觀察是中共將會要求一個由它控制的統一天主教會以作為對羅馬教廷讓步的報償。「八一七文件」先是宣示不能讓出梵蒂岡干涉中共的內政，包括宗教事務。台灣的「兩岸教會交流研究小組」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教友生活周刊上，發表長篇專文，認為接到「八一七文件」之後，「其內容實在替教廷捏一把冷汗；若未經切實準備，衡量得失，而冒然建交，所造成的不僅是對台灣教會的傷害，恐怕連（大陸）非官方教會也因此而消失^⑨。」同一天英國星期電訊報評論說，就在中共與其官方愛國教會一直開會討論與教廷和解事宜，美國和歐洲的天主教代表團也與中共就地下天主教會地位進行談判；然而，教廷獲得一份中共打算在梵蒂岡建交後，即同時對天主教地下教會展開清算鬥爭的文件，摧毀梵中（共）在不久將來建交的期望^⑩。

註⑧ 「大陸教會最新情勢的發展」，教友生活周刊，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八版。

註⑨ 同前註。

註⑩ William Ide, "Vatican opens unofficial channel for Beijing talks," *Taiwan News*, Nov. 22, 1999, p. 1.

對中國大陸教會而言，「八一七文件」的嚴重性在於，一旦中共與羅馬達成協議，目前還抗拒政府指導其宗教事務的地下天主教會，神學修道院必須被摧毀，對仍圖頑抗的神父、主教進行罷免孤立，或是再教育，以強迫勞改的手段加以根除。為此，羅馬信仰通訊社總編貝納德神父（Fr. Benard）表示，衡諸這些文件所揭示的政策，以及中共強硬分子要求對中國大陸三百萬地下天主教徒的鎮壓清算的情緒，他說：「真的很難想像教廷和中共能在不久的將來建立正式關係^⑪。」

為何「地下教會」為舉世所重，特別是教廷對之念茲在茲。此因，「愛國教會」與「地下教會」已成了分立的二元，前者屬國家政治體制管轄，後者則隸屬教會制度的權限。這二者的相互關係（愛國教會與地下教會，教廷與中共），形成了錯綜複雜，難以釐清的情況。

聖經中的「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向來是用來作為政教分立，形成政教分離的思想指南，問題出於：為政者常以「管理衆人之事」作為「政治」的定義，而把「宗教」也作為是「衆人之事」，是應由「政治」來管理的，也因此，為政者要自行任命主教，也是在「管理衆人之事」的範圍著想。

但是，駐梵蒂岡的教宗卻認為正常情況下，任命主教是宗教事務，不屬政治的範圍；宗教自由在普世宗教的理念下，任命主教應屬教宗的權力；任命主教是宗教內部的事，就如家庭中諸事一般，不是政治所可干涉的。這就形成對立而難以消解的二極化的觀點：中共認為上帝的歸上帝，但是上帝卻歸凱撒治理；而教廷的理解則是，凱撒的歸凱撒，但是凱撒卻歸上帝節制。中共認為宗教隸屬於政治的範疇；梵蒂岡則認為宗教是超脫政治的統治，並視此乃是普世的準則。

三、「主顯節事件」與「宣聖事件」

梵蒂岡堅持所祝聖的地區主教，必須對教宗的「羅馬主教」的首席權，給予絕對的承認與效忠^⑫。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太陽報獨家新聞指出，北京與梵蒂岡間馬拉松式秘談已有結果，如無特別意外，雙方將在年底前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發表專論說中梵建交的兩個主要障礙終於突破。在主教任命這個過去被視為內政的政治問題上，北京作出重大「讓步」，同意採取「越南模式」——即由北京先行提出主教人選名單，再

註^⑪ 同前註。

註^⑫ 教皇（Pope），天主教會最高稱號。約自九世紀起教皇專用於羅馬主教。據教廷指南，教皇全銜是：羅馬主教、耶穌基督在世上的代表、首席使徒的後繼人、西方教會最高教宗、西方牧首、義大利首席主教、羅馬教省樞機主教和都主教、梵蒂岡城邦元首。根據天主教義，教皇是衆使徒之首彼得的後生人；因此，作為羅馬主教，教皇似應對全天主教會有信仰、道德、紀律和行政上的最高權力。羅馬主教在宗教和政治方面都發揮重要作用，於是，隨著教會的發展，教皇至上的道理逐漸形成。區華勝神父著，「海霖教授的遺囑『改弦換轍』評介」，輔大神學院神學論集編輯室，神學論集一一〇號（一九九六年冬季）。

經梵蒂岡教廷委任。二〇〇〇年一月六日正是天主教會的「主顯節」，若望保祿二世在聖伯鐸（彼得）大殿，祝聖十二位主教之際，中共亦在北京南堂（北京教區主教座堂）祝聖五位主教。這項「主顯節」事件，暫時終止了梵中建交的所有傳聞。對所謂「越南模式」的存在，亦不攻自破。因為中共在「主教的任命權」上，無絲毫之「讓步」；北京所要求的顯然是特別的「中國模式」——即在主教權的任命上，北京享有完全的國家自主權。目前大陸愛國教會設有一百一十個教區，七十五位主教、助理主教，不過北京迄今沒有任命樞機主機，愛國教會副主席劉伯年說，「樞機主教的任命權屬於教廷」，預留了未來中（共）梵改善關係的空間。

教廷在二〇〇〇年十月一日「宣聖」中華一百二十位聖人聖女，台灣教區教友都以十分歡迎的態度，接受教廷的安排，並認為這是所有華人的光榮。台中教區主教王愈榮特別撰文記念。王主教以「欣聞教宗即將為中華殉道先烈宣聖」為題，對「宣聖」的意義和其影響加以簡單的解釋，王主教解釋教廷選在十月一日來「宣聖」的宗教含義，以此有別於中共當局及其宣傳媒體，一直質疑教廷為何選在「十月一日」，莫非此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好像教廷有意和中共過不去似的。但，實情恐非如此複雜。王主教說：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三月十日召開公開的御前會議，正式核定中華殉道真福趙榮司鐸等一二〇位宣為聖人，並訂於今年十月一日（主日）在羅馬隆重舉行宣聖大典。

依教宗本篤十四所說，「殉道」是「由於個人對耶穌的信仰，或堅持其他與天主有關的德行，而自願忍受考驗或接受死亡」。

「天主教教理」指出：「殉道是對信仰的真理所作的最高見證；殉道是至死不屈的見證。殉道者為死而復活的基督作證，他與基督因愛德而結合」（二四七三號）。

教宗訂於十月一日在羅馬舉行宣聖典禮，具有特別意義，因為該日是傳教區主保聖女小德蘭的慶日，同時也是主日^⑬。

中共官方自然不認同教廷的「宣聖」善意，而視其為教廷有意製造所謂「封聖事件」，來破壞梵中關係。二〇〇〇年十月一日「宣聖事件」，北京外交部在當日發表聲明，「把曾經在中國犯下醜惡罪行的一些外國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冊封為『聖人』，表示了極大憤慨和強烈抗議。」

「梵蒂岡口口聲聲之表示希望改善中梵關係，但在實際行動上卻一再干涉中國內政。……梵蒂岡這次所謂『封聖』活動，使實現中梵關係正常化的基礎受到嚴重損害，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只能由梵方負責^⑭。」

有關中台梵關係的幾個重要事件，特列表於次，請參考。

註^⑬ 教友生活周刊，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九日，第一版。

註^⑭ 人民日報（北京），二〇〇〇年十月一日，第一版。

中台梵關係的幾個重要年代表

1601	利瑪竇進京
1692	康熙宗教寬容
1706	禮儀之爭禁教
1860	英法北京條約，法國保教權
1922	宗座代表剛恒毅赴任
1943	首任駐教廷公使謝壽康
1945	亞洲首任樞機主教田耕莘
1946	中國聖統制成立，教廷首任駐華公使黎培理
1951	三自運動開始，黎培理被逐
1957	天主教愛國會成立
1958	大陸自選董光清等主教，請教廷承認，但教廷拒絕
1978	中共開始改革開放，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繼位
1998	若望保祿二世提升台灣高雄教區主教單國璽為樞機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成立
1999	教廷國務卿索達諾發表遷館論；八一七文件秘密公佈發表
2000	一月六日主顯節任命主教事件；十月一日教廷宣聖事件

教廷對外發言人則稱許這次中華聖人「宣聖」，乃是教宗對中國人民的尊崇與關懷。雙方看法如此南轅北轍，所謂梵中關係正常化，在可見的將來，都只是一個遠景。中共當局及其所控制的「愛國教會」，被迫指責教廷，同時亦將炮火對準台灣與香港地區。天主教香港教區助理主教陳日君發表公開文章，嚴厲批評中共對大陸主教進行「最殘忍的逼害」。文中更指中共的「中央駐港聯辦公室（中聯辦）」曾要求香港教區「低調」處理梵蒂岡宣布中國殉道者為聖人的慶祝活動，北京對他和大陸主教聯絡，也非常不滿。

香港回歸後，香港天主教區與梵蒂岡的密切關係會否受到影響，一直受到外界關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九九年中訪問亞洲國家時，原有意訪問香港，但中共當局以教廷與台灣有外交關係為由，拒絕教宗訪港。

陳日君被視為香港教區胡振中樞機主教的當然繼任人選，作風向來低調。他在明報發表題為「我們還以為這類『運動』已成歷史」一文，批評北京當局向大陸神職人員進行「最殘忍的逼害」，不少香港教友均感意外。

陳日君在文中指出，九月二十六日中共發表措詞強硬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關於梵蒂岡無視中國教會主權擬冊封所謂聖人的聲明」，他質疑這個聲明是否真的得到大陸全體主教的同意。「按中共傳統的手法，很有可能是掌權者的爪牙把這些話放在主教們的口中！」

他透露：「最近在大陸突然颳起了一陣暴風，政府逮捕地上、地下的主教、神父、

教友，組織地上教會各級領導的『學習營』（洗腦），要他們在討論會後發表意見，而『應該發表的意見』已印成而且發給大家：一、揭露西方列強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二、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五十周年和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三、抵制梵蒂岡『封聖』活動。」

陳日君認為「這突來的暴風，目的是要對付地上教會。已有一段時間地上教會的主教、神父逐一歸依羅馬……政府怕就將失控了，現在有一個機會，可以把教廷指為敵人，逼地上主教、神父們表態就範！這毒辣的陰謀簡直是強姦主教、神父們的心靈，是最殘忍的逼害。」

對於中共指梵蒂岡封聖「極大地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和中華民族的尊嚴」，陳日君反駁說：「傷害無數中國人民的感情及全世界愛好和平者的心的，卻是中共最近對國內教會（地上、地下）的粗暴鎮壓，使人想起人民共和國初期的一些『運動』，甚至聯想到文化大革命。我們還以為這類『運動』已成了歷史，想不到在這所謂『開放的年代』，在這期待著進入世貿的時刻，還能有這樣的情景發生。」

至於中共批評教廷宣聖前，沒有徵詢大陸主教團意見，只由「台灣地區主教團」越俎代庖，陳日君說：「中共從來不准教廷和大陸主教們來往。本人曾和所謂中國主教團團長劉主教通兩句電話，就引來中聯辦警告『北京對你非常不滿』。現在說要教廷徵詢他們的意見，真是笑話。」

他指出：「固然台灣主教最出力推進宣聖的事，但申請教廷宣聖的也有港、澳及海外的主教，更有四十位大陸主教（地上、地下都有），至於調查工作絕不是台灣主教辦的，那是教廷專責部門擔任的^⑯。」

上海教區主教金魯賢說：「封聖問題顯示，為了取悅台灣當局，教廷企圖分裂中國。」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回應，他們絕對不可能有能力操縱「宣聖活動」，北京的說法是「欲加之罪」，是一個「極權國家」的悲哀^⑰。

四、若望保祿二世的決策角色

若望保祿二世是教廷掌權人物，其行事作風，個人哲學思想均影響梵蒂岡的對外關係，不瞭解若望保祿二世，也就無法觀察教廷的外交動向。若望保祿二世曾任哲學教授，是一位現象學家。他所主張的是整合的人文主義。其個人哲學思想充分展現在他的海外訪問言行及《跨越希望的門檻》一書中。《跨越希望的門檻》該書名也可視為他本人的充分寫照。在這些書中，他嘗試面對人的生命、本性與存在的各種主要議題，尤其著重人為維繫存在與人性尊嚴所做的奮鬥。他重視的是行動而非空想、整合而非孤立、參與而非疏離。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九八年初訪問古巴，教宗是不是有意和共產主義無神論

^⑯ 註^⑯ 「北京干預香港宗教」，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五日，第十三版。

^⑰ 註^⑰ 「大陸指控台灣操控教廷封聖」，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六日，第十四版。

者進行大和解呢？教宗願意訪問古巴，豈不是更願意訪問中國大陸？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然而，教宗願意與共產主義無神論者進行「大和解」或者說是「交談」一詞來得比較精確，這絕不是表示教宗贊成共產主義的無神論主張。事實上，由以往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看到現任教宗不僅與無神論者進行交談，更與不同教派或宗教，例如猶太教、東正教之間也展開交談與和解的工作。或許可以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本人是出自重視「交談」的一代。因此，他特別重視與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交談。例如一九九五年夏天在台灣舉行的天主教與佛教交談會議，便是由教宗主動推動，而由時任高雄教區主教的單國璽與佛光山的星雲法師聯合主辦的。若望保祿二世也打破了近二千年來對猶太人的「原罪枷鎖」。原來西洋基督教社會對猶太人的歧視來自於「猶太人必須負起殺害耶穌的責任。」此一歷史血案的認知，係根據聖經新約的記載，是猶太人將耶穌交給羅馬總督比拉多，害得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雖然，梵蒂岡於一九六四年正式否認猶太教徒對十字架上的耶穌「有罪」，但對過去悠久歷史上西洋基督教社會對猶太人的污蔑及迫害，並沒有任何道歉的意識。但是，若望保祿二世這位出生於波蘭，祖國曾遭德國納粹鐵蹄蹂躪的天主教教宗，可說是歷代教宗中和猶太教徒和解進行最積極的一位。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八六年首次以教宗之尊親自造訪羅馬的猶太教禮拜堂；並在一九九三年宣布教廷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更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底的一項研討會，首度以教宗名義承認羅馬公教必須對過去西方社會迫害猶太教徒負起歷史責任。

至於羅馬公教——天主教與東正教的大和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更是滿懷信心，積極推動。冷戰後教廷將舊蘇聯的土崩瓦解視為「基督教思想對共產主義的勝利」。因之若望保祿二世想藉著與俄羅斯東正教的對話，以促使擁有同一個信仰的東、西兩教會能歷史性的大和解。這原本是歷史教宗的理想，但這個「合一運動」卻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上展開。但這個偉大的理想，是否實現的確是十分艱難的。結果本來預定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實現的若望保祿二世和東正教宗主教艾利克西的歷史性會晤，竟然在俄羅斯的保守派的群體反對下流產了。西方羅馬公教和東正教自從公元一〇五四年大分裂以來，從來都沒有進行和解的運動，然而羅馬教廷在政治上已和自舊蘇聯獨立出來的各國相繼建立外交關係。這一連串的動作，在在顯示若望保祿二世是一個行動的人，一個推動歷史發展的宗教領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出身波蘭，他對共產國家有深刻的認識，也更知道如何與共產國家打交道。迄今他所訪問過的共產國家沒有不發生重大變化的。我們也可以如此期待於教宗訪問過後的古巴。顯然，教宗與共產主義無神論進行「和解」或交談，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共產國家的人權改善與宗教自由。他非常重視人權，並以人權為正義的基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九八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還特別譴責：有人「公然以壓迫、衝突和貪污腐化等方式違抗人權宣言，或者，有人以更狡猾的方式，企圖給予不同的解釋，甚至故意曲解世界人權宣言的真正含意。」並批評「有些人利用所謂的文化差異來掩飾其違反人權的行為。」他並重申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的忠告：「首先要滿全正義的要求，因正義而應該付給的東西，不可當作愛的恩物施給。」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的諫諭，是對某些極權國家的施政作為，給予相當的警告。教宗對共產主義的敗亡，早已成竹在胸。他在《跨越希望的門檻》一書中，論到共產主義時說：「在某種意義下，共產主義制度是自己崩潰的，崩潰於它自己的錯誤與弊端。它是一劑比疾病本身還危險的藥物，並未做到真正的社會改革，反而成為全世界的威脅與挑戰，並因內部的脆弱而自取滅亡^⑯。」

五、教廷對兩岸的行事作風

天主教與中國的爭執，遠自清初因「禮儀之爭」就紛擾不斷，接著各式各樣的「不平等條約」的「保教權」，又加給了天主教為「洋教」的負面形象。這當中因中、西文化的差異，而造成彼此的誤解，其中另有原因之一也是梵蒂岡以「自我為中心」的外交風格，而使梵中關係漸行漸遠，這當然是十分不幸的歷史發展。衆所週知，梵蒂岡在歷史上並不只是一個小小的城邦國，而是面積廣大，領有包括全部羅馬城在內的「教皇國」，隨著義大利革命建國的成功，「教皇國」也只有走向解體的境地。

一八七〇年義大利國王艾瑪奴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統一義大利，並且強硬佔領了有「教皇國」之稱的羅馬城後，立即宣佈羅馬為義大利的首都。艾瑪奴二世雖曾對梵蒂岡做了諸多承諾，但教宗庇護九世（Pio IX）因不願受制於人而拒絕接受，並退守梵蒂岡內，以「梵蒂岡之俘虜」自居，以示抗議^⑰。

教宗庇護十一世於一九二九年與當時的獨裁者墨索里尼簽訂「拉特朗條約」，義大利政府正式承認梵蒂岡城邦為一個獨立王國。

梵蒂岡城邦面積雖然十分「迷你」但它卻是十多億天主教信徒的「精神信仰中心」。其領袖「教皇」，或譯為「教宗」，據歷史傳承是繼承十二宗徒之長——聖伯鐸的世間傳人。梵蒂岡將全球各大洲、各大小國，依教務情況劃分成「聖統制」或「代牧區」等。天主教會內的世界性傳教會，例如耶穌會，其主要會規之一即是「效忠教宗」，各男、女修會會士為普傳天主教而終身奮鬥。但是，教廷卻始終難以放棄其一貫偏西方的觀點來對待其亞非「傳教區」的人民；對中國近百年來的傳教史，教廷經常以「政治現實」作為考量的決策方針。雖然，今天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特別著文強調各地主教的職權、本土化和地方教會的地位；可是，我們也很難說梵蒂岡就會從此放棄其歷史的思維方式。除非教廷順應時代民主化潮流，放棄傳統上「君臨天下之勢」來對待其他教會。特舉數例以彰顯梵蒂岡這種歷史特性，希望有助於瞭解其外交行事作風。

1.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一日，教宗庇護十一世派剛恆毅總主教為首任宗座駐華代表。

^⑯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著，楊成斌譯，《跨越希望的門檻》（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民國八十四年一月），頁一七四～一七六。

^⑰ 王克祿著，梵蒂岡簡介，前引書，頁一五。

剛恆毅總主教在來中國之前為自己的使命與工作立下了五項方針，其中第四項為：「宗座對於中國，沒有絲毫帝國主義的野心，強烈的政治和宗座不相干。教宗愛中國，誠心謀求中國的福利。中國該是中國人的^⑩。」

2. 一九三一年，日本出兵侵佔中國東北，當時稱「滿州」，隨即扶植溥儀為新「滿州國」皇帝。一九三四年教廷不顧南京國民政府的抗議，逕自宣布承認「滿州國」，並就近委派吉林教區外籍主教高德惠出任駐長春「新京」的宗座代表。

3. 一九四五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教宗庇護十二世（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登基）於十二月宣布中國青島教區「代牧」（有主教銜，但非正職主教）田耕莘為樞機主教。庇護十二世這項任命是史無前例的，是亞洲第一位樞機主教，打破了清一色白種人所掌握的「樞機團」。

4. 一九四六年四月，教宗庇護十二世應田樞機之請建立「中國聖統制」，分中國為二十教省、七十九主教區、三十八監牧區，計一百三十七個教區。每教省設一總主教：即南京、北平、綏遠、瀋陽、濟南、太原、西安、蘭州、安慶、開封、重慶、漢口、長沙、南昌、杭州、福州、廣州、南寧、貴陽、昆明。並任命田樞機為北平總主教、于斌為南京總主教、周濟世為南昌總主教；另外尚有國人十八位擔任主教職，七人為監牧，合計為二十八位。

5. 一九四六年七月，教廷在南京設立駐華公使館，任命摩洛哥籍黎培理（Antony Riberi）總主教為首任教廷駐華公使。九月國民政府任命吳經熊為中國駐教廷大使^⑪。

6. 一九四九年六月，教廷聖職部發佈反對共產主義法令：

(1) 不可以報名加入共產黨或袒護共產黨，因為共產主義是唯物的，反對基督信仰的。

(2) 依據教會法典第一三九九條，禁止出版、傳播，或閱讀袒護共產學說或共產行動的書籍，或在刊物上投稿。

(3) 信友若明知故意自由地參與上述活動，不准領聖事。

(4) 若信友承認共產黨的唯物主義及反基督的邪說，甚至為這些邪說辯護、宣傳，將立即被視為背棄公教信仰，並遭受宗座特別保留的絕罰^⑫。

7. 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共南京軍管委員會宣布驅逐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總主教。

8. 一九七二年中（共）美「上海公報」發表後，教廷從台北召回葛錫迪大使（總主教銜），到今天已有二十九年。在過去漫長的四分之一世紀教廷儘量避免激怒北京，並想在與中共的外交關係上有所突破。可惜雙方卻在「主教職權的任命上」發生正面的衝突，直到今天尚未有任何結果。

註^⑩ 羅光著，教廷與中國使節史（台北：傳紀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再版），頁一三三～二一八。

註^⑪ 羅漁、吳雁編著，大陸中國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記（一九四五～一九八六）（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初版），頁二。

註^⑫ 同前註，頁八。

六、結論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中共公布的「宗教白皮書」中，提出中（共）梵建立外交關係的「兩項條件」說。此即：1. 教廷應先與台灣斷交，並「承認中共係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 教廷不得藉宗教之名干涉中共的內部事務。中共藉「宗教白皮書」提出與教廷改善關係的兩項條件，基本上並無新意，因為中共政要在過去的幾年間，在接受西方媒體詢問時，即會提過與教廷改善關係的這兩項條件。中共發布「白皮書」所顯示的政治意涵主要在於，中共期望教廷先與中華民國斷交，中（共）梵雙邊始能進入有關宗教議題與建交談判。教廷對第一項條件的回應，早在一九七二年中（共）美「上海公報」發表後，教廷即從台北召回葛錫迪大使（Edward Cassidy），將教廷駐台北的「大使級」關係降到「代辦級」關係，職銜也由「總主教」降為「蒙席」（Monsignor）^②。教廷的回應，對中共而言自是不能滿意。中共要求的是教廷必須首先與台北斷決外交關係，此即是召回駐台北代辦，閉館下旗。但教廷不僅是一個政治實體，也是一個宗教實體。教廷的考慮既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但以宗教為優先。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美國喬治城大學學者雷賽（Thomas Resse）出版梵蒂岡內幕（*Inside the Vatican*），教廷既無自然資源亦無國家生產，更無任何武力。教廷日常開銷是如何維持呢？答案是教廷最主要收入是教徒的捐獻，因為其全球忠貞的信徒超過十億人以上。從該書形容教廷對神職人員漫長而細心的培訓與陶冶，可知教廷十分重視其神職人員的服從、紀律與勤奮工作^③。若中國大陸愛國教會的神職人員不服從教宗，不遵守羅馬公教的紀律，教廷是難以只是為了與中共建交而放棄其歷史傳統與自我立場的。

退一步分析，若從國際政治的現實角度而言，即使是教廷這樣一個僅重視宗教事務的國家，亦未必不會向現實妥協。一九三四年教廷宣布承認「滿州國」一事，就值得台北朝野警惕。此所以我應密切觀察的是，教廷未來是否會爭取中國大陸高達一千萬的天主教徒，而改變對中共策略。香港、澳門已相繼回歸中國大陸，兩地天主教徒加起來達三十萬人，這個數字與台灣天主教人口相當。此所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早在數年前即提升香港主教胡振中為「樞機主教」，以凸顯香港教區的重要性。中（共）梵雙方有否可能利用港、澳來維繫對話管道？中共在香港、澳門施行兩地不同的「基本法」，但在對待天主教方面卻是一致的，就是准許兩地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保持原有的關係^④。理論上，維繫港、澳的宗教自由對中共改善形象具有正面功效，一方面它可藉此緩和西方國家與中共的人權衝突；另一方面，港、澳天主教會的存在無論是

^{註②} 「蒙席」是 Monsignor 的音譯，其在天主教會中的地位是介於司鐸（神父）與主教之間；是對擔任司鐸者的榮譽與晉升。

^{註③} Thomas Resse, *Inside the Vatican* (Washington: The Press of the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96), pp. 2~10.

^{註④} 中共在香港制定「香港基本法」，在澳門制定「澳門基本法」，均維持原有的宗教政策不變。

對中國大陸的愛國教會或地下教會，相當程度上皆能扮演與教廷溝通橋樑的角色，同時發揮中介與調和的功能，間接有助於中共舒緩愛國教會與地下教會間的緊張關係。未來可能的發展走向是，梵蒂岡會不斷藉港、澳的傳媒與宗教議題，設法與中共建立一條對話的管道。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聖彼得大殿廣場上，將樞機紅冠授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位主教、總主教。其中一位是台灣高雄教區的單國璽主教。教宗的這項任命，是台灣天主教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因為，自海峽兩岸分治，國府遷台後，台灣的天主教會始終以天主教在中國教區的正統地位自居；然而，自從于斌樞機逝世後，長時間以來，教廷一直僅為大陸（龔品梅）、香港（胡振中）地區的教會，保留樞機的職位，是故，這次的冊封，象徵台灣天主教的發展在教廷的眼中，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另外也可以進一步解釋成兩岸在國際關係競爭上的一大突破。因為，教廷長期所關切的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自由、傳教自由等問題，不但始終沒有得到具體的回應，反倒是自台灣全面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後，在國際視聽上已獲得相當的佳評。教廷在台灣地區挑選重量級教士，擔任樞機工作，其目的有二：第一，除肯定台灣政治民主化外，並藉此宣示台灣教區地位的正當性；第二，期望台灣地區的天主教會繼續發揮「橋樑教會」的作用，積極幫助中國大陸人民爭取傳教自由和民主化的發展。

一九九八年教廷要求台灣主教團將「地區」一詞寫在主教團正式名稱上，很明顯是避免對國際上已經形成的「一個中國」政策造成挑戰。但中（共）梵雙方要進一步達成建交協議，仍然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對中共而言，自然希望藉由中（共）梵建交，以進一步切斷中華民國在歐洲的兩個僅有的邦交國之一，其所付出的代價是放棄了對中國大陸天主教的領導權，若然則其四十年來苦心經營的「天主教愛國會」，有可能就此終解。更擔心的是基督教普世所推崇的人本主義思想，將隨著中（共）梵建交而進入中國大陸青年一代。

中華民國前駐教廷大使戴瑞明認為「遷館論」，是非常高明的說法，因為教廷傳統上「從不主動與其他國家斷交」，「遷館」說法正表示，「這不算與台灣斷交，而只是教廷『一個中國政策』的貫徹」。筆者的看法是，因為按照梵蒂岡的「一個中國政策」，中國既只有一個，那麼大使館放在哪邊都是一樣的。然而，教廷若不昧於事實的話，「遷館」的結局就是由否認中華民國去承認中共。

論到斷交，一般國與國斷交，也許不必以道德論。但教廷若在中共威脅下與台北斷交，則絕不是一個道德上中性的行為，而是嚴重違反道德與公義的決定。須知斷交之所以違背教廷傳統，其關鍵在於，斷交意味著天主教官方對某個國家的否認與棄絕。對罪人猶且要接納，對無辜者又怎能加以棄絕呢？故教廷不能否認任何人，也不能棄絕任何國家。我國現況雖非完美，但宗教活動向來有一定的自由空間，政治方面亦逐漸落實民主、尊重人權。論者又謂，中斷台梵關係即使於理不合，然而兩惡相權取其輕，大陸天主教徒千萬人口需要教廷關懷，台灣教會不過區區三十萬，為了更大的宗教利益，只好犧牲台灣了。

然而，必須嚴正指出的是，這樣的邏輯與教廷一貫的倫理神學立場是極不相容，相互扞格的。教廷官方向來主張，一個行為若是惡的，那麼，即使以它為手段能帶來莫大的「好處」，也絕不應該去作，因為人不可以為了達到「善果」而不擇手段。基於這個主張，教廷反對任何謊言、墮胎與安樂死。同樣的理由，教廷也三令五申反對人工避孕。蓋堅持道德原則是教廷自認責無旁貸的神聖使命。以此對照教廷在台中梵三角關係上的態度，不禁納悶，同一個教廷怎麼突然為了「行大事」而「不拘小節」起來？梵中關係的癥結，簡單地講就是主教任命權問題。深入點看，則碰觸到中央集權的中共與教廷對中國天主教會的掌控權之爭。由於宗教一向是社會控制的重要工具，中共既然掌控天主教愛國會多時，當然不肯輕易罷手，故堅持這是教廷不得干涉的內政問題。至於教廷則竭力宣稱，主教任命權是宗教與神學的事，非關政治。依此，即使台灣問題不存在，梵中建交必然仍是困難重重。儘管中（共）梵有所接觸，但雙方要發展全面關係至少牽涉四個問題：教廷與台北邦交關係；未來大陸地區主教選拔與任命問題；隸屬愛國會及地下教會教友間的融合問題；中（共）梵建交後，教廷駐北京代表與地方天主教間的接觸問題等。

中梵雙方要在這四點上取得折衷並非易事。例如，教廷與其邦交國多以宗教為考量，但中共已明白表示，無論是否改善與梵蒂岡的關係，中共都將繼續支持大陸天主教「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方針和自選自聖主教」，換言之，教廷頂多是形式上任命由中共提出的人選，這與教廷希望的「教友效忠教廷」存在極大差距。大陸地下教會教友也曾上書教廷，籲請教廷勿因與中共建交，讓愛國會統領他們，犧牲他們的權益。

* * *

Vatican-Beijing Relations in 2001

I-ming Chiao

Abstract

Judging from its territory and population, the Vatican is a mini-state. However, it is actually a religious entity ruling more than 1.6 billion Catholics all the world over. Moreover, the Vatican h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174 countries and observer status in man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ope often issues calls for peace and justice in response to situ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Vatican is a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big power" having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ile desiring to maintain good religious relations with the ROC on Taiwan, the Vatican wishes to improve religious relations and establish diplomatic ties with the PRC in order to promote religious freedom in mainland China and reestablish the Papal leadership over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ainland China. In fact, the China Diocese under the Holy hierarchy includes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Vatican's "one-China" policy, therefore, is based on the religious concept of "unity and communion." However, the Vatican's China policy is obviously problematic. Therefore, the Vatican earnestly hopes that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ill improve and the two sides can reach an agreement over their international status.

World nations seek "national interests" through diplomatic efforts, but for the Vatican, diplomacy is an instrument for promoting the free popularization of religion. The Vatican seeks n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out of a desire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the more than 10 million Catholics in mainland China to believe in and to propagate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2000, an informal dialogue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Vatican and Beijing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of views on normaliza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However,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since Beijing has insisted on both non-interference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fostering the "patriotic church" in mainland China.

Keywords: religious entity; Holy hierarchy; John-Paul II; Roman Catholic Church